

点石集

李时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点石集

李时人 著

李玉栓 李玉宝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点石集/李时人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023-2

I. ①点… II. ①李…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
中国-文集 IV. ①I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2271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点石集

李时人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7

字 数 282,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023-2/I·1697

定 价 68.00 元



李时人先生在家中书房



上：李时人先生与夫人汪华、儿子李根在一起，背景为李根画作《徐光启和利玛窦》，2013年

下：李时人先生与弟子们在一起，2009年

“《金瓶梅》热”的历史文化反思
——兼及《金瓶梅》研究的现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金》与晚明社会一出现，曾经引发了一场“《金瓶梅》热”。当时的清漪园袖香中郎在《临城》中将其与《金瓶梅》相提并论，称为“宝典”；又一封致其弟的信中大声疾呼：“《金瓶梅》一书，乃世之妖孽，不少人方百计收罗结抄，甚至不惜重资购求，一快为快，以求先睹为快，~~而不知~~未有弄《金瓶梅》的，则文苑界耻于沾此近一矣。其所制之书，所以玩味此一也。现得在三本年《新刻金瓶梅词话》并不是《金瓶梅》的初刻本。根据沈氏所存万历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东斋异记卷后所署的时间，可知《金瓶梅》初刻于万历45—47年。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的时间当为万历47年以后至天启改元之前（理由：①此年从第20回开始，一连十三次将“花子由”的“由”字改刻为“油”，为是遵天启皇帝朱由校名讳；②薛因《天象堂笔谈》曾提及初刻本有东斋异记卷后，他并未提徐序，故“新刻”不可断为初刻，但却是初刻的翻印本。）

附录：一、有人以为晚明燕昭堂毛刊《金瓶梅》外刻本故言非是，一、是误。

刻，按章出现了初刻，而崇禎年接需必出现（天启仅中），有人以为此崇禎年（陈鼎序说）不是明末是清有了书根据的，确是崇禎年（查四年将“花子由”改刻为“花子籍”，又将“读史格”改刻为“关世简注”只题天启（由校）、崇禎（由格）之讳，但此书未题略名已编为“讳——无甚儿）——以本可引证出以《金瓶梅》热，还续刻清初康熙年间，张竹坡评大刻于康熙后，~~整理~~^{增补}今传本，是有张评并刻过时的，但所刻卷已有旁条刊印看出《金瓶梅》署名是批警朝国的。④本书较早有一批署名注意外，《金瓶梅》（马廉、郭振祥、葛进东）等几篇关于《金瓶梅》的文章，按是从小说史和文学史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87版本子中，《金瓶梅》是列为禁书的，《金瓶梅》的书所以被提起来是在1980年前后，是从摆对原著开始的，在三四年内又先后出版了几种版本，~~其书名也改为《金瓶梅词话》~~其上《金瓶梅》也相应的热起来。一是研究热（一般人常提起中国四大小说，以前是大话、红楼梦和西游记与水浒传上足文字中的名著热的延续，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这四大部之一《金瓶梅》最热，其次就很快超过，近几年再开各种

序

恩师李时人先生治学已近四十年,著作等身,成就斐然,卓然可表者,《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全唐五代小说》《崔致远全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①,以及即将结题的《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等,皇皇巨著,嘉惠学林。借本集出版之际,不揣浅陋,将先生近四十年来的治学经历、学术成果和治学思想作一梳理,以为序文。

一

先生的学术起步于20世纪八十年代,时值学界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重视小说、戏曲的趋势而掀起小说、戏曲研究热潮。在这样一股热潮中,先生的注意力首先聚焦在《西游记》《金瓶梅》这两部明代“奇书”上,先后发表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合撰)、《〈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谈〈金瓶梅〉的初刻本》、《“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②等三十余篇论文,平均每年有3篇文章见刊,用力之勤、速度之快、成果之多,即使在实行量化考核的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除此以外,先生还发表有关于《红楼梦》《聊斋志异》《说岳全传》等的研究论文^③,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治范围从一开始就非常广泛。

① 各书版本为:黄山书社1992年版、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初版(中华书局2014年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中华书局2018年版。

② 文章分别刊于《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③ 参见《关于〈说岳全传〉》(《中国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3期)、《〈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合撰,《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2辑)、《李汝珍》(《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等。按,凡先生成果一律不注作者。

1991年,先生将前十年有关《西游记》《金瓶梅》的研究论文同时结集出版^①,这是先生对此前研究的一种总结,以此为出发点继续向前推进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取得突破。在广度上,由《西游记》《金瓶梅》为主要研究对象扩展到对我国古代禁毁小说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关注,如《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泛论——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化谈片之一》,进而推广到中国古典小说在域外的流播情况,如《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②在深度上,《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新创造》从更高更新的视角去审视《金瓶梅》,在《三国演义:亚史诗和亚经典》中提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亚史诗”与“亚经典”的概念,在《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中则采用“前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来解读西门庆形象。^③整个90年代,先生除发表论文十余篇之外,出版各类专著十余部^④,平均每年要出版一部著作、发表一两篇文章,如此丰硕的成果令人震惊之余也让人很难想象先生是如何做到的。

世纪之交,学术界对近一百年来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整体性的回顾和反思,先生也不例外,梳理了20世纪有关唐五代小说、宋元小说、《金瓶梅》等的学术研究状况,并撰写多篇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的总结性论文。^⑤

进入21世纪以后,先生在继续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同时,开拓了明代

① 参见《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北方论丛》1993年第3期、《复旦学报》1998年第6期。

③ 《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3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5年7月19日。

④ 除《西游记考论》《金瓶梅新论》以外,其他著作分别是:《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黄山书社1992年版;《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合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古训新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上下册),陕西三秦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全唐五代小说》(五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汝珍及其〈镜花缘〉》,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版。

⑤ 参见《20世纪唐五代小说研究的回顾》、《20世纪宋元小说研究的回顾》、《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等,分载《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2000年第4期。

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两者齐头并进。在小说方面,更加侧重于域外汉文小说,发表了《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渊源成书》、《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合撰)^①等一系列论文。在明代文学方面,1996年应中华书局之邀,着手编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此后数年间埋头于明代作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尤其是2000年以后,更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明代作家研究上。一方面,指导研究生撰写有关明代文学的学位论文,在这些论文在出版时还专门撰写序言,如收入本书的《〈江苏明代作家研究〉序言》、《〈明代文人结社考〉序言》、《〈江苏明代作家文集述考〉序言》、《〈李维桢研究〉序言》等。^②在这些序言中,先生除了就论文本身的内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外,一般还会拓展开去,对明代文学的诸多方面加以评析,或谈整体特点,或论具体问题,或述研究方法,都是先生对明代文学长期研究之后的思考和结论。另一方面,先生自己则专注于《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的编纂,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该书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面世。2013年,先生又作为首席专家获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13&ZD116),虽近古稀之年,仍然笔耕不辍。

二

历观四十年学术成果,先生治学可谓“既宽广又突出”。“宽广”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在范围上从先秦、魏晋到唐宋、明清,在文体上从小说、戏曲到诗词,在内容上从名家名著、文学史到文艺理论,在方式上从辑录、评选、校注到专论、通论,无不有所涉猎,惟是多寡深浅不同而已。“突出”则体现在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明代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代表性的乃或标杆性的成果都是出现在这两个领域。

① 《文史》2001年第53辑、《人民政协报·学术版》2004年1月12日、《复旦学报》2006年第3期。

② 参见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中华书局2013年版;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文集述考》,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鲁茜《李维桢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

就小说领域而言,先生的研治内容包括文本、文献、理论、方法以及传播与影响等各个层面。在文本方面,除《西游记》《金瓶梅》以外,先生对其他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等,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在对这些小说名著的研究中,有的考索故事原型,如《〈西游记〉闹天官故事形成考辨》、《日本学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索》^①;有的探讨作者身份,如《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论考证的态度与方法》、《李汝珍“河南县丞之任”初考》^②;有的又是辨析文献版本,如《〈四游记〉版本考》、《〈谈金瓶梅初刻本〉补正》^③,等等。其中,有关《金瓶梅》的研究,曾被评论认为是“代表了目前《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准与新成果”^④,相关研究成果亦被收入《金学丛书》。^⑤

在小说文献的整理和编订方面,先生对短篇小说、禁毁小说、唐人小说以及域外汉文小说等都作了大量工作^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从1987年开始,先生着手编订《全唐五代小说》,至1998年正式出版。该书曾被列入国务院“八五”古籍整理重点出版计划,共收唐五代小说2114篇(正编1313篇,外编801篇),逾400万字,全部由先生独立编撰完成,编订工作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作为今人编撰的第一部断代小说总集,《全唐五代小说》自面世以后就被誉为“文化积累工程”,成为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唐五代小说经常参引的重要依据,何满子先生则将此书定位为“唐代文艺总集的三鼎足”,高度评价说:“他孜孜矻矻,辛苦经营十年,终于完成了这件与《全唐诗》、《全唐文》鼎立的文化基础工程。”^⑦2014年,中华书局予以再

① 《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5年第18期。

② 《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明清小说研究》1987年第6辑。

③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④ 魏崇新《〈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与新成果——评李时人〈金瓶梅新论〉》,载《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第72页。

⑤ 参见《李时人〈金瓶梅〉研究精选集》,《金学丛书》第二辑第18册,吴敢、胡衍南、霍现俊主编,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版。

⑥ 参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游仙窟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

⑦ 何满子《十年辛苦不寻常——谈〈全唐五代小说〉这一文化工程》,《出版广角》1999年第2期,第62页。

版,詹绪左先生作了复校,在校改了原稿一些讹误的同时也充实了大量篇幅,使得版本更为精良。

先生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乃至“小说”这种文体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定见。比如“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用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风俗史、心灵史”,“不仅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小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叙事艺术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而散文体小说则是“叙事文学的最高形式和人类成年的艺术”;中国古代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实际上是同源异流,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的总体格局和历史景观”;中国古代小说是在中国古代发生的一种文化和文学事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所以“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理应提出契合自身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的理论、方法”,等等。^①这些观点是先生在长期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产生的认识,也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各种问题的理论基点。尤其在小说的观念上,先生“在长期研究心得基础上做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认为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正统的小说观在本质上都是非文学、非艺术的,从未强调过“小说”的叙事性和文学性,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进步,带来了种种理论上的混乱”。^②因此,先生与何满子前辈多次交流探讨,最终提出了符合现代美学的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十条”标准,在学界引起了高度关注。

先生常言自己要撰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是“一部自鲁迅以来有别于诸家的小说史”(先生语)。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感于后出的小说史相对于《中国小说史略》来说“似乎没有多大的超越”的状况,先生就说“这是使我们古代小说研究者感到惭愧的事情”,“在新的时期,我们就应该努力来改变这种现状”。^③为此先生曾经从何满子前辈手中接过编写《中国小说史》的计划,何先生也对此寄予厚望,并将此事记入他的“口述自传”中。^④可惜后来先生在编纂完成《全唐五代小说》之后,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明代作家的考察与

① 《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弁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页。

② 《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载《文学评论》1999年3期,第142、145页。

③ 《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第59页。

④ 参见何满子《跋涉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研究中,《中国小说史》的撰写就此被长时间搁置了下来,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对于小说的研究方法先生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例如在小说主题的研究上,先生认为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我国古代优秀的长篇小说,在进行主题研究时不能试图“用一种简单的、抽象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概念或逻辑命题来概括作品的全部内容”,因为“这几部古典长篇小说都反映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表现了非常复杂的思想意义”,用一个或几个抽象的思想概念是不可能概括得了的。^①关于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扩大研究领域和改革方法,先生的看法是:“研究方法更新的关键在于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更新”,要弄清各种方法“对文学研究的适用性和应用范围,从而加以合理使用……各种研究方法要兼容、互补”。^②直到21世纪以后,先生对这些问题仍然给予关注,并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论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百年来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剧烈动荡和频繁变革联系密切……在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和学术思想背景下,形成了各种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只有对这些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从理论上进行认识、总结……才能更好地推动古代小说研究合理的发展”。^③并由小说而延及对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思索:“古代文学的研究的基础理论、学科理论,可以是多元的、开放的、允许探索的”,“古代文学研究要想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提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决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④先生对古代小说以及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积极思考和有益探索,对当下乃至以后的相关研究都具有一定启示和垂范意义。

除了国内的古典小说,先生对域外的汉文小说也颇为关注。先生曾为韩国庆熙大学闵宽东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专门撰写序言^⑤,

① 《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65页。

② 《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第56—57页。

③ 《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第24、27页。

④ 《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3年3月26日。

⑤ 参[韩]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序二》,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

并先后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范围覆盖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①后与翁敏华先生、严明先生合作出版《东亚汉字文化圈古代文学论集》,先生在《弁言》中大力倡导对“东亚汉字文化圈”古代文学的研究理应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由对域外汉文小说的研治提升为对域外汉文学的重视。^②2009年,先生在香港大学作有关域外汉文小说的学术报告,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古代小说的渊源和发展作了全景式的描述,认为上述诸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发展乃至繁荣都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是古代东方文学曾经高度发达的见证”。^③为此,先生又与聂付生、杨彬、刘廷乾、汪俊文等弟子合作,用时十七、八年精心撰写了《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全书分为三卷,分别对中国古代小说在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传播时间、传播途径、传播范围,特别是对各国小说产生、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了详尽论述,从各种繁富复杂的资料中理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线索,从而展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在东亚各国传播与影响的立体式图景。^④

先生还非常重视小说辞书的编纂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先生就与何满子前辈汇集明清两代白话长篇小说和包括文言、白话在内的中、短篇小说的鉴赏文章,合作主编了《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其中列入的小说篇目基本包举了“社会上有影响的、群众能见到的全部品种”。^⑤近年来,又与张兵、刘廷乾合作编写了《〈西游记〉鉴赏辞典》,遴选76个重要情节和31个主要人物分别进行“故事情节鉴赏”和“人物形象鉴赏”,该书被列入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古代小说名著鉴赏系列”之一,“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和谐统一”^⑥

① 如《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文史》2001年第57辑)、《〈游仙窟〉的日本古钞本和古刊本》(合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合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等。

② 《东亚汉字文化圈古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③ 《“东亚汉字文化圈”各国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09年版,第1页。

④ 该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目前已经完稿和结项,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⑤ 《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前言》,第2页。

⑥ 《西游记鉴赏辞典·出版说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的特点可以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这些辞书既为小说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也为小说爱好者提供了入门工具,《明清小说鉴赏辞典》后面还附录《明清小说在国外》和《近代四十年(1949—1989)明清小说刊本索引》,就更大程度地发挥了小说辞书的“工具书”作用。

三

在明代文学领域,先生首先是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界定。如“文学”,包括“古人使用各种文体撰写的种种‘有韵之文’、‘无韵之文’”在内的“结撰文字成篇而着文采者”,都可被视为“文学”。又如“作家”,凡是从事“文学作品”写作之人,“既包括著作等身、彪炳史册之大文学家,亦包括名不出乡里,甚至仅以写作自得其乐之作者”,都可以被称为作家。^①而对于“明代作家”之“明代”的界定,除了政治史上通常所说的自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之间的276年以外,“对于由元入明和由明入清之跨代作家,则主要遵循年龄与政治态度的双重标准综合考量取舍”。我们说,不同的研究者因其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不一样,对于同样的学术概念界定和使用也会有所不同,但像先生这样尽可能地放大概念外延的做法也着实不太多见。先生之所以倾向于如此宽泛的概念,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一方面是想藉此再现明代文学创作的全貌,从“最高的枝条”到其下面的“枝枝叶叶”都能够给予一定的关注;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现在所谓的“小作家”很可能尚有未被发现的作品,因为“历经四百年历史沧桑,作品存佚多寡亦不同”,为避免遗珠,对于一些仅存一、两首诗歌或一、两篇文章的作者也不应轻易地置于研究视域之外。^②

在明代文学领域,先生将其精力主要用在了对明代作家的全面考察和考订上。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就是《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七卷本

① 参见《〈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编纂细则》(未定稿)。按,先生认为“作家”与“文学家”是有区别的,“文学家”一定要有突出的文学成就,而“作家”则未必如此,“凡是有作品存世者都可以被称为‘作家’”(先生语)。

② 参见《〈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编纂细则》(未定稿)。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是中华书局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先生接受《明代卷》的编纂任务之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到底应该选择哪些作家入编大辞典,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又需要对将近三百年间所有明代的作家作品进行普查。最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共考索出明代有文学作品传世的作家 20 000 多人,有传世的明人诗文总集、选集、别集约 5 000 种。这是对长期以来困扰和阻碍明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数据问题的有力回答,是继《列朝诗集》《明诗综》以来在明代诗文的研究资料上向前迈出的的一大步。在如此近似“海选”的基础上,再从中遴选出 3 000 余人入编《明代卷》,对他们的生平经历、文学活动、著述情况、成就评价以及生平事迹的主要资料来源等一一进行述介。

在对明代作家、文集进行广泛搜罗的同时,先生也对明代文学的特点予以归纳。先生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及,认为明代文学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各种文学样式同步发展,“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戏剧文学)同时发展,雅俗交融,并行不悖”,而且“文学人口(作者和读者)大量增加,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往古、带有一定‘近代气息’的文学景观”。二是各种文学创作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所占份额增大,成为时代‘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探讨齐头并进、相互影响,“从而更多地表现出文学的自觉和主体意识”。四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古代文学“终结期”的特色,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明代文学“庞杂却并非无序”,“陈陈相因却又充满了创造性和指向未来的张力。”^①先生的这些概括不仅高屋建瓴,对于我们认识明代文学的特质有着指导性意义,而且相对于当下一些有关明代文学史的研究来说,表述别具一格,更具个性魅力。

在明代文学研究中,先生一直秉持“时”“空”交叉的观念和方法。“文学

^①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序言》,2013年4月初稿,2015年4月修改。《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由中华书局于2017年12月出版,撰写本文时尚未见到该书。有关明代文学特点的认识,先生最早是在家里给学生讲课时提到,但因其时是在授课过程中,所以仅有观点而较少论述,后来在为刘廷乾、鲁茜等人的学位论文撰写序言时形成了系统性的文字表述。参见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文集述考》,第1页;鲁茜《李维桢研究》,第4—5页。

不仅因时而异,亦因地而异”^①,是先生研治明代文学乃至对于中国文学的基本观点。今天的“地域文学”研究异常繁盛,但早在十几年前先生就对此作过明确阐述: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文学也是在“时空”范围内发生的现象,因此不仅是一种时间现象,也应该是一种空间现象。古代文学研究中,只有既注意时间,又注意空间的多维研究,才能真正描绘出各个历史时代文学发展变化的立体的、流动的图像。^②

在先生看来,此前的“文学史”研究比较注重“时间”维度,对中国古代文学规律的探讨比较注重文学的“时间性发展”,而对“空间形态”及其流变有所忽视。先生认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多维的研究和对历史动态的揭示”,才可以“更多地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流变的内在机制”,“进而探讨文学兴衰的直接动因”。而且,“中国的文学”因其独有的民族性特征应该更加重视“地域”维度的研究,这是因为“在庞大的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文学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③先生主张“从‘地域’角度出发的考察和研究,理应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要想将研究推向深入,我们理应加强或重视从‘地域’角度对古代文学的研究”。^④先生的明代文学研究正是循着这样一种思路展开的,所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多以地域划分(分省或分府)进行明代作家和文学研究,仅已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就不下40篇,先生自己则全力攻关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按照计划,该项目将按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省)的划分,对明代20000多位有作品传世的作家的生平、

① 《〈历代江西词人论稿〉序言》,《历代江西词人论稿》,邱昌员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江苏明代作家研究〉序言》,第1页。

② 《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0页。

③ 《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第40页。

④ 《〈江苏明代作家研究〉序言》,第2页。